

广西新生代农民本土就业影响因素探讨

岳雪莲

(桂林理工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广西 桂林 541004)

摘要: 利用2011年广西新生代农民本土就业调查数据,运用 Logistic 回归模型对新生代农民本土就业的影响因素进行定量分析。结果表明,个人因素、家庭因素、外部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就业状况有重要影响。要提升新生代农民本土就业水平,应继续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力度、扎实推进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优化区域环境和家庭创业环境等。

关键词: 新生代农民;本土就业;个人因素;家庭因素;外部因素

中图分类号: C91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433X(2014)01-0044-04

农民有效就业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也是改善民生中应有之义。当前,新生代农民逐渐成为农民工的主体。截止2010年12月,中国新生代农民已超过1.5亿人,外出务工的新生代农民超过1亿。新生代农民不仅包括新生代农民工,还包括留守农村的新生代农民。过江鸿认为留守农村的新生代农民是新农村建设的生力军,也是传承农村优秀文化的中坚力量^[1]。石丹渐和田晓青调查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的工资与福利水平、劳动关系状况、求职培训状况等均不容乐观,建立流通的信息传递机制、构建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障制度等将是提升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的有效手段^[2]。研究还表明,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期望“高移化”、职业转换“高频化”的特征较为显著。郭飞等认为户籍制度、自身素质因素是制约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的关键因素,发展职业教育、建立城乡一体的就业服务体系、社会保障体系等将是改善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的重要途径^[3]。面对全国范围内的“民工荒”,学界再次将问题解决的焦点集中指向了新生代农民工。不少学者认为,新生代农民工表现出特殊的就业偏好是导致新时期“民工荒”与就业难并存的重要原因。张施和林欣怡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在流动偏好、区域偏好、行业偏好、工资水平偏好、对政府就业帮助偏好等方面存在极大的差异^[4]。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返乡就业、创业、社会保障制度等一系列问题一直是学界研

究关注的焦点。

事实上,影响新生代农民就业因素的研究一直为国内外学者所关注,但是从经济学视角研究的案例并不多见。Carnevale是最早关注代际问题的社会学家,他认为代际之间的性格与价值取向有很大的差异,这也是造成职业转换差异的重要内因^[5]。Chao发现,新生代员工最重要的价值取向是工作生活平衡,也即基本的休闲价值观^[6]。新生代农民本土就业一词是针对新生代农民就业的空间结构、就业结构等方面特点而言的,其就业质量的高低直接关系到新农村建设的成效、解决“三农”问题的成效。与进城务工的新生代农民相比,留守农村就业将面临外部环境更为恶劣、劳动力市场更不完善、就业收入更不稳定且更低、就业结构更为单一、社会保障制度更为缺失等不利因素。如何准确找出影响新生代农民本土就业的影响因素,并给出相应的解决途径,是值得探讨的问题。本文利用2011年广西新生代农民本土就业调查数据,运用 Logistic 回归模型对新生代农民本土就业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定量分析。

一、研究设计

1. 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本研究将被解释变量定义为新生代农民本土就业状况。为便于统计与分析,将就业状况分为就业与未就业两种(就业为1,未就业为0)。选取三组因素作为解释变量:(1)个人因素,主要包括性别、身体素质、文化程度、个人本

收稿日期: 2013-05-06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项目“西部城市少数民族新生代农民工焦虑因素研究”(12YJA850008); 2011年桂林理工大学人才引进项目“广西罗城仫佬族流动人口研究”。

作者简介: 岳雪莲,女,桂林理工大学讲师,博士,主要研究民族社会学和社会工作。E-mail: graceyxl@126.com

土就业意愿、培训经历、婚姻状况、技术水平、社会资本 8 个方面,个人因素也是识别新生代农民就业差异的基本维度。(2) 家庭因素,主要包括家庭规模、家庭本土就业意愿、家庭经济状况、家庭社会资本状况 4 个方面,家庭因素作为新生代农民的社会资本也是影响其就业重要因素。(3) 外部因素,主要包括社会保障制度、土地承包与流转制度、公共服务制度、就业培训制度 4 个方面,农村社会发展的外部因素是影响新生代农民本土就业动机的重要诱因。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本土就业的新生代农民,指的是被调查对象户籍在农村,且以自己户籍隶属的市(县、镇、乡、行政村)为常住地,包括留守新生代农民、返乡农民工。本研究原始数据来源于 2011 年对广西罗城县、武鸣县、恭城县新生代农民本土就业调查数据进行的问卷调查。共发放调查问卷 750 份,回收有效问卷 608 份,有效回收率为 81.1%。其中,罗城县、武鸣县、恭城县三地的调查对象人数分别为 270 人、212 人和 126 人,所占比例分别为 44.4%、34.8% 和 20.8%。女性 278 人,占 45%,男性 330 人,占 55%。未婚或无配偶的有 186 人,占 30.6%,已婚或有配偶的有 402 人,占 69.4%。文化程度分别为:小学及以下 32 人,占 5.3%;初中 304 人,占 50%;高中 134 人,占 22%;中专或技校 72 人,占 11.8%;大专及以上学历 76 人,占 10.9%。

2. 实证方法。首先采用 SPSS19.0 统计软件对

三组因素进行单因素分析,通过交叉表分析和卡方检验,筛选出对新生代农民本土就业状况有影响的变量;再通过 Logistic 回归模型进一步确定筛选的变量对新生代农民本土就业的影响程度。

二、实证结果与分析

从表 1 中可以看出,新生代农民个人因素、家庭因素及外部因素都对新生代农民本土就业状况有重要影响。

1. 个人因素对新生代农民本土就业的影响。

在个人因素方面,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新生代农民性别、身体素质、教育程度、个人本土就业意愿、技术水平、培训经历与本土就业均存在着显著的相关关系。由表 1 可知,相对女性而言,男性就业是女性就业的 1.7 倍;身体素质中等的就业发生比是身体素质差的 2.6 倍,身体素质优良的新生代农民就业发生比是身体素质差的 1.4 倍;教育程度为小学及以下、初中、高中、中专或技校的新生代农民就业发生比分别是大专及以上学历就业发生比的 0.2、0.5、0.8、1.6 倍;中等技术水平新生代农民的就业发生比是技术水平低等的 1.5 倍,拥有高级技术水平新生代农民的就业发生比是低级技术水平就业发生比的 3.4 倍;参加过专业培训的新生代农民的就业发生比是未参加过任何培训的 1.6 倍;愿意本土就业的新生代农民的就业发生比是不倾向于本土就业的 3.8 倍。

表 1 新生代农民本土就业影响因素 Logistic 回归结果(N=608)

解释变量	b	Sig	Exp(b)	解释变量	b	Sig	Exp(b)
性别(女)	0.786	0.006	1.675	技术水平(低)			
身体素质(差)				中等	-0.574	0.001	1.087
中等	0.882	0.010	2.583	高级	-0.331	0.005	2.326
优良	0.734	0.005	1.361	是否参加专业培训(否)	-0.426	0.009	3.567
教育程度(大专及以上学历)				是否愿意本土就业(否)	0.568	0.010	2.791
小学及以下	-1.768	0.001	0.235	家庭经济状况(不富裕)			
初中	-1.316	0.013	0.468	一般	1.036	0.005	1.437
高中	-0.949	0.003	0.783	富裕	0.845	0.007	2.891
中专或技校	-0.891	0.011	1.578	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	0.975	0.007	0.673

注: -2LL 的值为 289.138; Nagelkerke R Square 的值为 0.193; 预测准确率为 88.7%。

分析结果显示,新生代农民性别、身体素质是影响其本土就业的基础性因素,新生代农民本土就业意愿、教育程度、技术水平及培训经历则是影响其本土就业的决定性因素。就性别而言,相对于农村和

小城镇的就业需求结构而言,男性的就业适应性与就业能力更强,这也与男性的身体素质有关。此外,新生代女性农民更多地将承担生育与家庭护理职责,其就业意愿、有效就业供给能力均显著低于男

性。身体素质好的新生代农民就业能力更强,更容易在就业竞争中取得成功。需要指出的是,体形对就业的影响也不可小觑^[7]。

新生代农民本土就业意愿越强,就业动机越大,调动就业资源的积极性越高,其就业发生比也越高。教育程度、技术水平以及培训经历是人力资本水平的重要体现,人力资本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就业结构,并决定收入水平。著名经济学家舒尔茨认为,对农民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尤其是教育投资,是改造传统农业的有效手段,也具有极强的反贫困效果^[8]。从分析结果可以看出,新生代农民并非受教育程度越高,就业发生比就越高,中专或技校程度的新生代农民就业发生比高于大专及以上学历的新生代农民就业发生比。

2. 家庭因素。从表1可以看出,家庭经济状况对新生代农民本土就业有显著影响。家庭经济状况有显著的正面影响,家庭经济状况富裕的新生代农民就业发生比是家庭不富裕的新生代农民的就业发生比的2.9倍,家庭经济状况一般的新生代农民就业发生比是家庭不富裕的新生代农民就业发生比的1.4倍。一般而言,家庭经济状况作为新生代农民成长的生活环境,将对新生代农民的人力资本积累、社会资本积累、就业结构选择等产生很大的影响。从理论上讲,家庭经济状况越好,新生代农民先天获得的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等就越多,在后天人力资本投资强度、社会资本获取能力方面也将获取一定的优势,在同龄新生代农民就业准入时拥有优于家庭经济状况差的资质,他们在就业过程中获得必要的物质支持,使他们掌握更多的就业信息及相关的社会资源^[9],其就业搜集能力、就业选择空间、就业迁移能力等也较强,因而,家庭经济状况好的新生代农民就业于一级劳动力市场的可能性也越大。

3. 外部因素。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与否对新生代农民本土就业有显著的正面影响。在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情况下,新生代农民本土就业发生比是不健全或社会保障制度缺失的状况下就业发生比的0.7倍。社会保障制度是新生代农民生活的外部环境,对新生代农民就业幸福指数、城乡两地就业意愿等均将产生较大影响。实践表明,农村地区社会保障制度的不断完善有利于提升农民生活的幸福感。更进一步讲,这种幸福感对于新生代农民克服就业过程中的辛苦压抑感以及低端就业的挫败感有重要的缓冲作用。

三、广西新生代农民本土就业特点

1. 就业的空间结构狭小。就业空间结构主要反映就业主体职业获取能力以及活动半径。新生代农民本土就业的空间结构按就业地域活动范围及所占比例划分,可以依次分为本自然村与相邻自然村之间未出本行政村(10.54%)、本行政村与相邻行政村之间未出本城镇(46.19%)、本城镇与相邻城镇之间未出本地级市(31.58%)、本地级市与相邻地级市之间未出本省(7.03%)、跨省(4.66%)。不难看出,新生代农民本土就业地域活动范围在本行政村与相邻行政村之间未出本城镇的比例达到46.19%,累计所占比例高达89.46%。表明新生代农民本土就业活动范围相对狭小,这与农村地区道桥建设等基础设施建设薄弱有关,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新生代农民本土就业能力较弱以及农村劳动力分布特点。当然,这里也涵盖了新生代农民的恋家情结、孝道等文化含义。调查显示,部分新生代农民之所以愿意留在农村就业,就是因为离家近,好照顾家庭,也能通过代际影响,形成大家庭的规模效应,缩减生活成本,增加家庭幸福感。

2. 就业以第二产业为主。就业的产业结构主要反映的是就业主体职业技能与自身素养对职业的获取能力与选择能力。新生代农民本土就业的产业结构按第一、二、三产业及细分产业所占比例划分,依次分为第一产业就业(14.83%),包括粮食生产、蔬菜瓜果药材等经济作物种植、养殖业。需要指出的是,约有八成从事农业的新生代农民是由父辈带领,约六成的新生代农民对所从事的农业表示出较为浓厚的兴趣。第二产业就业(55.44%),包括建筑业、农副产品加工、食品制造业、木材加工及家具制造业。第三产业就业(29.73%),包括交通运输业、批发业和零售业、居民服务业。留守新生代农民第二产业就业比例占比过半,第三产业就业约占三成,表明留守新生代农民就业以第二产业为主,但第三产业就业容量也不可小视。新生代农民虽留守本土,但非农就业已超过八成,当然其中仍有非农就业为主兼业农业的情形。但第二产业中以建筑业等为主要就业方向,这与农村地区近十年来的建房高峰有关。

3. 本土就业收入提高。就业收入结构主要反映就业主体职业获取能力以及就业质量状况。新生代农民本土就业的收入结构性别差异较大,其中男性的收入要明显高于女性。男性收入结构呈现梭子形态分布,以1600-1800元/月为梭身,平均月工资达

到 1750 元; 女性则呈现手榴弹形态分布, 1000 - 1800 元/月占比高达八成, 1800 - 4000 元/月约占两成, 平均月工资达到 1500 元。实际上, 新生代农民工工资分布结构与就业结构有直接的关联关系, 与社会价值观和利他价值观也有一定的关联^[10]。需要指出的是, 新生代农民就业工资收入结构并不能完全真实反映其生活水平, 因为农村兼业较为普遍, 一个拥有一种或者多种技能的新生代农民不仅能专职从事一项职业, 还能利用闲散之余从事更多更灵活的职业, 以便弥补一项职业收入之不足。

四、政策建议

第一, 继续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力度, 不断优化新生代农民人力资本结构, 促进人力资本结构、物质资本结构与知识技术等耦合效率。建立以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为基础的人力资本补偿机制, 保障农村人力资本有效供给。一是按照财权与事权相匹配原则, 中央政府、省(市)政府应无偿向农村地区转移供给相当量的公共物品, 改善农村地区人力资本投资的外部环境, 重点巩固农村地区的基础教育、职业教育, 增加新生代农民学习、在职继续教育的机会; 二是以增加农民收入为基点, 切实把农村教育放在超前发展的位置, 进一步加大教育投资力度, 在巩固农村基础教育的基础上, 提高职业教育经费占当地政府财政支出的比例^[11]。三是加大农村人力资本

培养模式的财政支持力度, 推行农村人力资本“师范化”培养模式, 不断完善农林、师范、医学等学科领域免费培养制度, 保证农村专业技术人才的持续供给。

第二, 扎实推进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改革, 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随着我国统筹城乡发展战略的推进和推进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 新生代农民的就业环境将稳步改善, 幸福感大幅提升^[12]。但是对于新生代农民而言, 不同的社会保障项目, 在满足需求和保持积极进取的社会态度方面, 效果是不同的。调查显示, 在各类社会保障制度中,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对改善新生代农民生活状况和社会态度效果最为明显^[13]。此外, 新生代农民对失业保险制度的诉求也较为强烈, 而对明晰的养老保险制度、工伤保险制度等的要求, 相比第一代农民工而言则相对较弱。

此外, 优化区域环境、家庭创业环境促进新生代农民创业也是就业的重要源泉。加强农村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体系建设, 尤其是要强化农村地区道桥建设, 提升新生代农民本土创业与就业的空间活动能力。不断深化农村土地制度、金融制度、财税制度等制度改革, 采取更为积极的财政、税收、扶贫等手段^[14], 促进区域环境、农民家庭经济状况的改善, 优化新生代农民创业的外部环境。

参考文献:

- [1] 过江鸿. 贫困地区留守新生代就业影响因素研究[D]. 武汉: 武汉理工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1.
- [2] 石丹浙, 田晓青.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现状调查[J]. 调研世界, 2013(3).
- [3] 郭飞, 夏建军, 毕树广.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问题的研究[J]. 农业经济, 2012(11).
- [4] 张施, 林欣怡.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偏好调查研究[J]. 前沿, 2013(2).
- [5] Carnevale D G. Trustworthy Government: Leadership and Management Strategies for Building trust and High Performance [M]. San Francisco: Jossey - Bass, 1995.
- [6] Cennamo L, Gardner D. Generational Differences in Work Values, Outcomes and Person - organisation Values Fit [J]. Journal of Managerial Psychology, 2008(8): 891 - 906.
- [7] 潘杰, 秦雪征, 刘国恩. 体形对城市劳动力就业的影响[J]. 南开经济研究, 2011(2).
- [8] 西奥多·W. 舒尔茨. 改造传统农业[M]. 梁小民,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0: 28.
- [9] 马芒, 徐欣欣, 林学翔. 返乡农民工再就业的影响因素分析[J]. 中国人口科学, 2012(2).
- [10] 尤佳, 孙遇春, 雷辉. 中国新生代员工工作价值观代际差异实证研究[J]. 软科学, 2013(6).
- [11] 周亚虹, 许玲丽, 夏正青. 从农村职业教育看人力资本对农村家庭的贡献[J]. 经济研究, 2010(8).
- [12] 杨晓锋, 赵宏中. 湖北省农民新生代农民本土就业影响因素研究[J]. 湖北农业科学, 2013(7).
- [13] 李培林, 李炜. 近年来农民工的经济状况和社会态度[J]. 中国社会科学, 2010(1).
- [14] 朱明芬. 农民创业行为影响因素分析——以浙江杭州为例[J]. 中国农村经济, 2010(3).

(责任编辑 李吉和)